

風雨沉舟記

——章乃器在1957

• 章立凡

無論是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1957年那場政治風暴的前前後後，父親始終是一位不斷引起爭議的人物。有的人激賞他那種剛正不阿的性格，譽之為「中國骨頭最硬的知識份子」；而在另一種場合中，他又被偉大領袖金口玉言地賜予「帶着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的人」的「活諺」。成為這樣一位集毀譽於一身的人物，或許是他在歷史上的幸運，但也可能是他在現實中的悲劇。

自1979年起，我不斷為父親的平反問題提出申訴。民建、工商聯（父親是其創始人）的胡厥文、胡子昂老先生均主張平反，但當年積極鬥爭他的孫曉村、胡子嬰卻聯名致函中共中央，反對平反。1980年4月間，有消息說，當年被劃右派的27位知名人士中，父親在不予改正之列。我手持當年印發的《關於右派份子章乃器的材料》到胡耀邦同志處上訪，又分別給鄧小平、陳雲同志上書。同年6月傳達的中共中央60號文件，父親的名字列在改正的22人之首。

在1957年那場政治風暴的前前後後，章乃器始終是一位不斷引起爭議的人物。有人譽之為「中國骨頭最硬的知識份子」；毛澤東說他是「帶着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的人」。他當上「右派頭子」殆非偶然，因為命運早就由他的性格決定了。

一 整風之前的兩場爭論

現在回想起來，父親在1957年當上「右派頭子」殆非偶然，因為他的命運早就由他的性格決定了。父親的性格剛正耿直，他一生經商、治學、從政，始終未脫書生本色。他的老友許漢三曾回憶說^①：

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後，有些黨外人士心存客氣，或有所畏懼，對執政黨的政策或對普通黨員有意見，甚至發現錯誤，多數唯唯稱是。而章乃器遇到這種情況，則不僅與其爭論，而且還進行鬥爭。我怕他受到打擊，多次勸他不要這樣做，他總是反過來批評我，說我的意見實際上是「明哲保身」的個人主義和作客思想。他多次在公開講話或私人談話中，

在1955年5月民建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章乃器提出「紅色資產階級政黨」的說法，本意是強調民建的進步性，不料許多人不同意這個提法，遂引起了一場持續到1957年的爭論。圖為章乃器（叼煙斗者）1957年在糧食部的批判會上。



勸人不要有作客思想。要把國家的一切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不辭勞怨，全力以赴。

父親除擔任國家的糧食部長外，還擔任民主建國會及全國工商聯的副主任委員，這兩項職務經常涉及有關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政策問題。早在1957年反右以前，他在兩個問題上曾與一些同事發生激烈爭論。

第一個是關於民建的性質問題。在1955年5月民建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父親作工作報告時插了幾句話，大意是說：「在國際友人面前，可以說民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但同時要說明，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一個政黨。如果外賓們說：那你們的黨可以說是『紅色資產階級政黨』了，我認為可以欣然承認。」他這番插話中所提的「紅色」不過是形容詞，用以修飾「資產階級政黨」，本意是強調民建的進步性，不料許多人不同意「紅色資產階級政黨」的提法，遂引起了一場爭論。

父親在辯論中引用了列寧和劉少奇關於資產階級在歷史上進步作用的論述，以及劉少奇「紅色資本家」的提法作為佐證。他還談到：「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曾指着我說：『我很同意你的紅色資產階級的說法，難道我們還允許白色資產階級存在？』我提的是『紅色資產階級政黨』，既然可以說『紅色資產階級』，為甚麼不可以說『紅色資產階級政黨』？」^②

到了1957年反右時，毛澤東改變了說法：「右派中間那些不願意變的，大概章乃器算一個。你要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就不幹，他說他早就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你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你還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③此乃後話。

第二個爭論的問題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民主革命時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軟弱、妥協的一面；建國初期的提法是既有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1956年公私合營基本完成後，在同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父親一直抱着消滅階級的社會理想，出於響應毛澤東「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號召，曾在一些內部場合探討新時期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他提出：如果將「八大」政治報告中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公有的歷史任務已經基本上完成的論斷，解釋為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物質基礎已經基本上消滅了，「那麼我們就可以說，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兩面性也已經基本上消滅了，留下來的只是殘餘或者尾巴罷了。」「與其籠統地提兩面性，還不如在大力鼓舞生產積極性的前提下，具體的指出那些必須改造的資本主義的思想作風。」^④出人意料的是，他這些在內部探討的意見卻被搬到一些會議上進行公開批判，並被貼上「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的標籤。於是父親不得不應付一場新的辯論，並一直持續到1957年。

在私營經濟大量出現、且在國民經濟中重新佔有一席之地的今天，回顧這兩場辯論，確實令人有不勝今昔之感。在當時的歷史舞台上，父親的悲劇角色似乎已是命中注定。儘管如此，父親仍保持他直言不諱的風骨，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統戰工作座談會上，他對黨派關係、階級關係、黨與非黨關係等問題提了不少尖銳的意見，批評了人為製造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簡單化、統戰工作庸俗化等傾向。

毛澤東當時已對這位老朋友很有看法，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一次黨內會議上說^⑤：

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們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這段話可為後來的「引蛇出洞」策略作一注腳。

整風開始前，章乃器在4月15日的一次發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他認為：「革命領袖有時為革命辯護講的話，就不能機械地用來指導今天的革命工作。」「不要神化任何個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

二 整風期間的三次發言

1957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早。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歡迎黨外人士幫助整風，並提出應該放手鼓勵批評，堅決執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4月30日，

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毛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向自然界宣戰。」在此次會議上，他表示自己不準備連任國家主席，並允許透露消息。

5月間，在一派「和風細雨」的迷人春色感召下，知識份子、青年學生和人民群眾紛紛直陳己見，對黨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當時稱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評意見。全國進入鳴放高潮。誰也不會想到，僅僅一個月之後，階級鬥爭的號角又重新吹響，「向自然界宣戰」變成了向「早春天氣」宣戰。

父親一直主張獨立思考。整風開始前，他在4月15日的一次發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他認為：「革命領袖有時為革命辯護講的話，就不能機械地用來指導今天的革命工作。」並舉出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革命不是繪畫繡花」和〈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兩句話為例，指出「現在生產建設有些工作細緻些，尤甚於繡花」；在革命勝利後對反革命份子的改造中，「也不是採取殘酷手段，而是採用革命人道主義的」。他主張：「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要粗暴，不要神秘，不要僅僅喊沒有內容的、抽象的口號，不要神化任何個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毛主席就一貫反對把他神化起來。」^⑥

為發動黨外人士幫助整風，中共有關部門5月間在北京分別召開了民主人士座談會和工商界人士座談會。當時，父親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糧食部的工作上，計算全國糧、油的平衡，準備在即將召開的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發言。自1952年主持創建糧食部以來，父親為了解決六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每天都工作十個小時以上，連星期天也很少休息。由於工作繁忙，他在整風期間只參加了三次鳴放座談會。

在鳴放中，非黨人士普遍反映「有職無權」。在5月8日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父親提出：「要解決有職有權問題，必須克服宗派主義思想。現在有一部分黨員，黨內一個是非，黨外一個是非，把『黨黨相護』當作黨性。有人批評了黨，明明意見是對的，黨員也不承認；有人提的意見儘管是符合黨的政策，但是只要黨員負責同志一搖頭，非黨員要堅持意見也是很困難的。」講到這裏，他聲明說：「不過，我是有職有權的。在糧食部裏，黨組和我的關係是正常的，黨組管政治思想領導，我管行政領導，黨組和我有了分歧意見，要能說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這個有職有權，是鬥爭得來的。現在，可以說，經過鬥爭達到了團結的目的。」父親認為，說工商界要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的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說法，脫胎是脫凡胎，換骨是換仙骨。現在工商界已經過了五關（戰爭關、土地改革關、抗美援朝關、五反關、社會主義關），就是說，脫胎換骨的改造，也已經改造過了，如果還要脫胎換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無窮的憂慮，如何能不消極自卑？」^⑦

次日一早，父親打開《人民日報》，發現自己昨天的發言赫然刊載其上。當天他再度參加座談會時，便向統戰部李維漢部長說：「我認為會議是內部會議，內容是不發表的，發表了我覺得有點意外，我怕會影響大家發言的積極性。」李部長說：「以後發表與否，聽各人自便；但發表了，對推動全國的運動有好處。」

章乃器認為，「照道教的說法，脫胎是脫凡胎，換骨是換仙骨。現在工商界已經過了五關（戰爭關、土地改革關、抗美援朝關、五反關、社會主義關），就是說，脫胎換骨的改造，也已經改造過了，如果還要脫胎換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無窮的憂慮，如何能不消極自卑？」

5月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但只作了簡短發言，鼓勵大家暢所欲言。13日他因事沒有參加民主人士座談會，只送去一篇題為〈從「牆」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的書面發言，並附一函給李維漢說：「稿子是『信筆直書』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發表，請領導同志掌握，我並無顧慮。」這篇書面發言也於次日見報。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在黨與非黨之間存在着「牆」和「溝」，於是有黨的領導人提出要「拆牆填溝」，開誠相見。父親在這篇書面發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說的『我們共產黨員是具有特種性格的人，我們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這句話，是不科學、容易引起誤解的，可能有不少非黨人士會以特殊的眼光看待黨員，造成某些修養不夠的黨員以特殊自居。這樣，這一句話自然也就成為『牆』和『溝』的一種思想基礎了。還有很值得注意的一點：一千二百多萬黨員，只要有1%的黨員犯錯誤，絕對數字就是十二萬多人。這麼多人在領導地位上犯錯誤，對國家和人民就會造成巨大的損害。」

他還批評了「以黨代政」的現象，指出不少黨員對國家機構的作用還沒有足夠認識。國家行政機構的作用不但沒有被足夠的運用，就連國家的權力機構也沒有被足夠地重視——縣以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不正常和不充實的情況是嚴重的。他主張：黨組織有如戲劇的編導，其他國家機構有如演員、藝術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編導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應代替其他人員。這樣，黨組織可以使自己的頭腦更加清醒，從而令領導更加全面、主動^⑥。

三 反右派鬥爭正式出台

5月20日凌晨，父親呷了一口青花瓷杯中已冷的龍井茶，燃起煙斗在書房內踱步。寫字台上，平攤着剛剛完稿的〈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的問題〉，這是《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題目，為了趕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趕寫。自從聽了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以後，他感到心情很舒暢，這一夜他在案頭直抒己見，一揮而就。但父親不可能知道，此時在黨內一些高幹的案頭，正放着毛澤東五天前寫的黨內通訊〈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中有一段後來很著名的話：「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甚麼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⑦他也不可能知道，一些領悟了偉大領袖戰略意圖的黨內領導，這兩天正忙不迭地給某些黨外朋友暗中打招呼，勸他們免開尊口，免得日後吃罪不起。父親更不可能知道，十天之後，毛澤東在一篇題為〈關於「特殊材料製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的文章上作了批示，該文發表於前一天的《新聞日報》，署名「小雅」，對父親〈從「牆」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一文提出反駁。毛澤東批道：

喬木同志：

此篇似可轉載，何時轉載適宜，請你和報館商量一下。

毛 五月三十日

章乃器在〈從「牆」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的書面發言中提出：「還有很值得注意的一點：一千二百多萬黨員，只要有1%的黨員犯錯誤，絕對數字就是十二萬多人。这么多人在領導地位上犯錯誤，對國家和人民就會造成巨大的損害。」

這篇文章與作為反右第一炮的社論〈這是為甚麼？〉，一同被安排在6月8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

5月31日，父親出席民建中央召開的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並即席發言，《大公報》、《人民日報》先後發了新聞。由於兩報發表的內容很簡略，且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開夜車將發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關於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幾個問題〉的標題，於6月3日送交《大公報》編輯部。

在這兩篇文章裏，他回顧了不同歷史時期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他認為：階級最後必須被消滅，但人是可以改造的。從這點來看，階級本質與人的階級特性是有所不同的。難道曾經有從娘胎裏出來就一定要當資本家的人？「脫胎換骨」的提法會把改造工作變得神秘化，使人望而生畏^⑩。

他還對定息的性質發表了看法。當時經濟學界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定息是剩餘價值，另一種認為是剝削而不是剩餘價值。父親則提出：從整個階級來說，定息是剝削的殘餘；而具體到個別的階級份子來說，定息是不勞而獲的收入^⑪。

父親認為：「假如不幸而讓教條主義在中國革命當中起主導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不幸，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損失。」^⑫「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為，資本主義已經肯定不可能在我國復辟，而官僚主義卻隨時可以在我們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復辟。在資本主義當中，我們還可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產、經營上有益的經驗和知識，為社會主義服務；而官僚主義則是『一無是處』的糟粕。這就是為甚麼一個社會主義企業加上了官僚主義效率反而不如資本主義企業的理由。」^⑬

進入6月以後，形勢果然像毛澤東所預言的那樣發生了變化。先是由國民黨元老何香凝老人出面，於6月1日發表書面談話說：「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口是心非。心裏嚮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裏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我認為顯然是右派了。」^⑭這是「右派」首次作為一種政治新概念，出現在新中國的政治舞台上。6月3日民主人士座談會結束時，毛澤東在李維漢的總結發言稿上加了一句話，說座談會上提出的批評和意見「有相當一部分是錯誤的」^⑮。

6月5日，初夏的北京落了一場雨。在國務院禮堂召開的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已有人開始對父親的言論提出指責。據民建的黃炎培（任之）老先生在日記中記述：當天下午四時半，周恩來總理來談中央結束鳴放的日期及對鳴放的看法等問題。夜九時半，黃任老從睡夢中被喚醒，緊急召往中南海頤年堂去見毛主席，工商聯的陳叔通老先生也同時被召見（此前不久，兩老曾聯名上書，請求毛不要辭去國家主席職務）。毛同兩位大老談了「鳴放中發見種種」，認為：「章乃器是和我們走兩條路的」；還談到「章伯鈞反動語」，「他和羅隆基勾結了」。毛澤東希望黃任老回到民盟去（他曾是民盟發起人之一，後又於1947年主持解散民盟），但任老有自知之明，回答說「走不進」。三人至十二時二十分方結束談話。這場談話給父親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謂的「章羅同盟」定下了調子。

毛澤東既有此旨意，而兩老平日與父親又有齟齬，他們第二天就在民建、工商聯的一些相關人士中奔走相告。這時，父親應《工商界》月刊之約撰寫的〈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的問題〉一文尚未發表，於是有人打電話來，要他同意

1957年6月5日，毛同民建的黃炎培、工商聯的陳叔通兩位大老談了「鳴放中發見種種」，認為「章乃器是和我們走兩條路的」；還談到「章伯鈞反動語」，「他和羅隆基勾結了」。這場談話給章乃器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謂的「章羅同盟」定下了調子。

將其在工商界座談會上的討論提前印出。6月7日，這篇文章在會上散發，立即成為有系統的攻擊的靶子。

6月8日《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發表了毛澤東為該報撰寫的社論〈這是為甚麼？〉，同日，中共中央下達了毛澤東起草的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反右派鬥爭」就從這一天正式開始，「和風細雨」一下子變成了急風暴雨。

當天，舉行了最後一次工商界座談會，父親雖未與會，但已陷入重圍。此後的十餘天裏，批判急劇升級，火藥味越來越濃，帽子越來越嚇人。他從一位與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變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頭子」。

四 為革命利益不怕戴右派帽子

當其他人在冥思苦想如何從這場鬥爭中逃脫劫難的時候，父親卻要作反批評。他在6月9日工商界座談會的書面發言中說：「在幫助黨進行整風的時候，只要是根據事實，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完全可以不提優點，只提缺點，這是正常的；和黨共事日久，說話不從『擁護一番』說起，而是老老實實『開門見山』地說，更是正常的。這都說不上甚麼『脫離社會主義』或者『脫離領導』。」他在會上不但堅持自己的觀點，還為受到批判的李康年辯護。他批評少數人乘機用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對自己有利，表現「唯我獨忠」的姿態。他表示相信「共產黨代表了工人階級忠誠老實的品質，是不會表面一套，裏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擊，黨是會明是非的，是非最後也一定會明的」^⑥。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聯常委聯席會議上，他兩度與人舌戰，逐條反駁對他的批判。針對有人歪曲他的觀點，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駁一個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來批判，不要認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經過化驗。」他強調：「我認為毛主席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提出黨整風，是個很英明的號召。……如果在整風運動中，把『牆』拆掉，把『溝』填平，過去互相抵消的力量變成互相協作，共同為社會主義事業努力，我想，把社會主義事業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時間，是完全可能的。」^⑦

與會者都是與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輩，但此時個個將面孔翻起，露出唇槍舌劍。下面摘錄的一小段會議記錄，可略見一斑^⑧：

章乃器：否定運動的成績，否定領導的話，我從來沒有說過。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從來沒有一句話否定「三反」「五反」等運動的成績，也從來沒有一句話否定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我講得明明白白，白紙黑字。

王新元：你巧妙的地方就在這裏。

陳叔通：你就是這樣巧妙地否定黨的領導。

章乃器：叔老，你是年高德劭的人，不要這樣急，最好冷靜一點。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是在資本主義消滅以後，在反官僚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聯常委聯席會議上，章乃器兩度與人舌戰，逐條反駁對他的批判。與會者都是與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輩，但此時個個將面孔翻起，露出唇槍舌劍。在當時的形勢之下，雙方各唱各的調，無法進行相同水平的理論交鋒，只剩下了以數量取勝的「人海戰術」。

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內部鬥爭中。我說這句話是表示對官僚主義的痛恨，不能說是留戀資本主義。……希望同志們按照整風的精神來處理，按照整風運動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討論這些問題，處理這些問題。我要求組織少數人討論，也就是這個意思。

陳叔通：你違反憲法，是兩條路線的問題。

章乃器：那是你的憲法。

在當時的形勢之下，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靜氣的說理。父親引經據典的滔滔辯才，淹沒在口號聲和帽子堆中。這真像是一場與聾人的對話，雙方各唱各的調，無法進行相同水平的理論交鋒，只剩下了以數量取勝的「人海戰術」。也許是對這種無意義的對峙感到孤寂，也許是預感到被推上祭壇的命運已定，他在會上說了這樣的話：「有人要求民主黨派輪流執政，我是不贊成的。假如由民主黨派輪流執政，我從民建某些同志的行為來看，我是會被陷害的。」「我這人不勉強爭取做左派，但是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別人給我戴右派的帽子。」^⑨有了這種「一切放下」的悟性，父親的態度顯得更加灑脫，他經常持着英國煙斗，從容不迫地在各種場合應對各種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報社召開緊急社務會議，批判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一進會場，章乃器就對章伯鈞說：「宗兄，你檢討了，我看早了一點吧？」還有心替他們二人說話。他說：「儲安平的言論（即〈黨天下〉一文），從政治來看是不能說離開了社會主義的。他的動機還是為了國家的好。」

6月15日，光明日報社召開緊急社務會議，批判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該報當時是民主黨派共有的報紙，各黨派都有領導人擔任社務委員。黃炎培是社務委員，過去常常主動出席，這次卻臨時把開會通知書推給了父親。父親也是社務委員，出席會議是分內之事，他明知是個陷阱，但還是坦然與會。

一進會場，他就對章伯鈞說：「宗兄，你檢討了，我看早了一點吧？」因為同樣姓章，故便以「宗兄」相稱。但兩人除了開會見面之外，並無私交。至於儲安平，父親只是在一些場合與他握過手而已。

這時的章伯鈞、儲安平，眾人已是避之唯恐不遠，批之唯恐不痛，更不用說為他們辯護了。父親自己也是眾叛親離，反倒有心替他們二人說話。他說：「儲安平的言論（即〈黨天下〉一文），從政治來看是不能說離開了社會主義的。他的動機還是為了國家的好。」「並不是說對毛主席和周總理就不能提意見，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們本人是歡迎提意見的，但是可以寫一封信或請派個人來談一談。」「公開發表可能傷害全黨、黨中央威信的言論，這一點對負責精神是不夠的，應當很鄭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務會議上，又有如下的對話^⑩：

章伯鈞望着坐在他對面的章乃器，說：「我的宗兄是不是談談，給我提提意見？」

王昆侖笑着說：「是同宗嘛，把你們的家務事攤開來談談吧！」

章乃器笑望着章伯鈞，說：「你到我家只去過一次，我還沒有到你家去過哩！」

章伯鈞半笑着說：「我們人沒有聯繫，思想有聯繫吧！」

章乃器於是向章伯鈞提出這樣的意見：「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還不顯著。我看他是粗枝大葉，兼職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兩個

黨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協、人大、交通部。也許黨務管得細。光明日報和國務院的事，該打屁股。……安平向你請教，恐怕你說話是相當隨便；坦白，是好的，這恐怕給安平錯覺，助長他錯誤思想的發展。……我的宗兄，你對國務會議很馬虎，很少發言，很少研究，常遲到早退，責任心不夠。因此，你翻過來講國務會議開得不好，不發揚民主、不深入細緻，我不同意……」

父親在發言中談了對整風的看法，他說：

我從前到外地視察，開座談會，發現有幾種人態度不正常：(1) 舊知識份子、舊人員；(2) 工商業者；(3) 沒有民族關係的宗教界人士。這幾種人，我常察言觀色，情緒不正常。因此，我感到過去幾次大運動，是必需的，但遺留下來的副作用，是嚴重的。這次整風中發現，有許多人以往看來庸庸碌碌，這次大鳴大放，發表的意見從理論到業務，頭頭是道，天才都發展出來了，我非常高興。

對於這次運動中的人際關係，他另有一番高論：

據我向醫院接觸，有兩種病人特別多，一是神經衰弱，二是血壓高。我想，在運動中，鬥人者難免得這種病，被鬥者更難免。……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應該心安理得，輕鬆愉快地考慮。因為問心無他，何必驚惶？希望在整風中，批評者、被批評者都本着和風細雨的精神。

五 我要對周總理說幾句話

父親雖然呼喚和風細雨，但迎接他的卻是雷電冰雹。先是千家駒指責他在座談會上「放毒」，報上還刊出了一幅他與章伯鈞互相塗脂抹粉的漫畫，題曰「宗兄宗弟」，民建中常會隨即撤銷了他的光明日報社務委員職務。6月19日，民建、工商聯又通過決議，停止他在兩會的一切職務。一場圍剿式的大批判鋪天蓋地而來。

6月20日，民建的兩位處長奉命來家中與父親談話，要他作檢討。父親回答說：「現在要我檢討，我只有反批評。」但他仍表示：「糧食部的業務工作我還是繼續幹。我準備給國務院寫報告，要求檢查我的言論和行動，是否反對社會主義，如果反對，就解除我的糧食部長職務好了。人大、政協明年再提名選舉時，不要再提我的名。」兩處長問：「毛主席的文章發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據其中的精神作檢查？」他回答：「我覺得，我的言行沒有違背那六條標準。」

兩處長所說的毛主席的文章，即指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的講話。6月19日，這篇講話由《人民

6月25日國務院舉行全體會議，周總理提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段批判章乃器的文字。章乃器突然站起來，動情地說：「我要對周總理說幾句話。作為總理，批評幫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幹部，只根據他所說的兩三句話，就說他是反對社會主義，這個斷語，是不是值得考慮？」一番話直指人心，語驚四座。

日報》正式發表，人們發現增加了「六條標準」，並在原講話宣布「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之後，加上了一大段話，即強調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6月25日國務院舉行全體會議，討論周總理即將向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報告》。報告在談到當前的反右時，有一段批判父親的文字。父親突然站起來，動情地說：「我要對周總理說幾句話。你是總理，我是協助你工作的國務院幹部，過去工作中遇到問題，總是大家共同分擔困難。現在我遇到了問題，作為總理，批評幫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幹部，只根據他所說的兩三句話，就說他是反對社會主義，這個斷語，是不是值得考慮？」

一番話直指人心，語驚四座。以折衝樽俎、辯才無礙著稱的周公竟一時語塞。其他人見勢頭不好，群起而攻之。父親力持己見，並且聲明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愛護黨中央就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

周公當時一直被毛澤東指為「右傾保守」，被迫做檢討才勉強過關，剛好又趕上整風反右，形勢比人強，事關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他只有堅持黨性，作違心的批判。最後他對父親說：「你不悔改，將自絕於人民。」會議就此不歡而散。

這是兩位相交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唯一傷了感情的一次爭論。父親的話份量頗重，是一種道義上的責備，其對周公內心的刺激恐怕也非同一般。他倆後來在另一些場合見面，父親仍是一副俯仰無愧的態度，周公則溫語有加，往往作出一些額外的寬容姿態以示彌補。

由於多年來不斷搞運動，中國人的觀念變得很容易走極端，歷史也變成了任人隨意塗抹的小姑娘。當父親「走紅」時，他的履歷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民主革命、一貫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人士，到了牆倒眾人推之際，便有了下列種種說法：「愛國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國是為了創造向蔣賣身投靠的資本」、「勾結特務、反革命、右派份子進行陰謀活動」、「破壞土改」、「一貫違法亂紀的不法資本家」、「組織反黨小集團」，等等，等等。翻開當年的報刊，這樣的批判詞比比皆是，大多出自與父親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有不少更是歪曲父親原意的批判：如父親原話是「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截去後半句就變成「定息不是剝削」，與原來的意思大不一樣。

吳大琨教授年輕時曾受到父親的幫助和提攜，當時卻積極地鬥爭他。父親曾指出思想改造要「脫胎換骨」的提法會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負擔，吳教授則加以演繹，稱：章乃器說工商界在過「五關」之後，還要有「脫胎換骨」、「抽筋剝皮」的最後一關。此話上達天聽，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談到右派抵制改造時也引以為據，並表示不解：「這位先生，誰人去抽他的筋，剝他的皮？」^②更有甚者，父親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鉛筆大王」吳羹梅，過去有困難時曾屢屢受過父親的恩惠與保護，此時竟反咬一口，糾集一些人，乘機對父親提起訴訟，提出資產要求。

反戈一擊，是50年代開始的一種時尚，其給國人道德情感造成的傷害，也是十分致命的。要從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上認識朋友，這場運動提供了最好的機會，也開創了最壞的先例。父親一直到逝世，都不肯原諒某些傷害他最重的

吳大琨教授年輕時曾受到章乃器的幫助和提攜，當時卻積極地鬥爭他。吳教授稱：章乃器說工商界在過「五關」之後，還要有「脫胎換骨」、「抽筋剝皮」的最後一關。此話上達天聽，毛澤東談到右派抵制改造時也引以為據，並表示不解：「這位先生，誰人去抽他的筋，剝他的皮？」

朋友。其實這些朋友，在後來的十年浩劫中，也和他一樣品嚐了苦果，近年來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懺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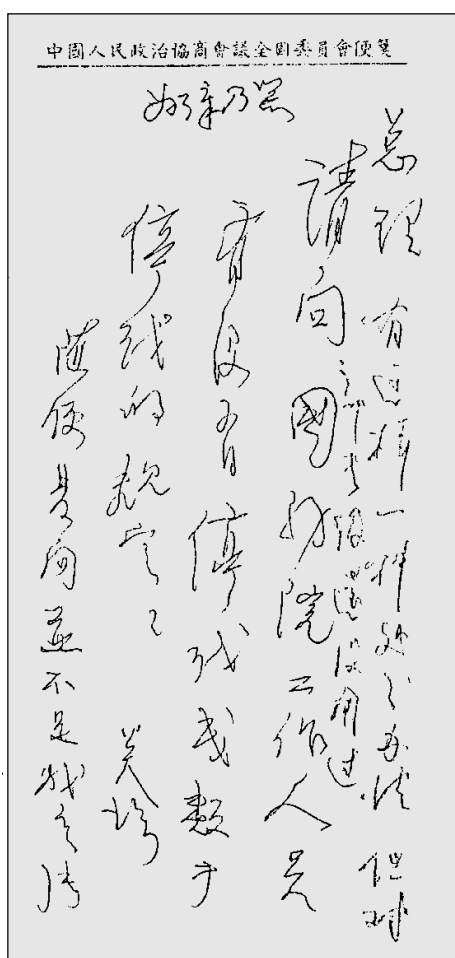
六 從民主人士到極右份子

1957年6月26日，一屆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這是一場對中國知識精英的大圍獵。陷入網中的「右派」們，不得不放下學者名流的身段，在各小組內接受無休止的鬥爭乃至謾罵，違心地作屈辱的檢討。父親仍拒絕強加的罪名，聲稱自己「不是一個政治家，也不配做一個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檢討，他沒有氣力。他在會上做了書面檢討，承認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思想和作風」、「個人英雄主義和個人自由主義」，但不承認自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並逐條辯駁了強加的種種罪名。他說^②：

八年來，我對黨所提出的方針、政策，不但沒有任何懷疑，而且往往還覺得是出於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體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見的，是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與黨員的合作共事關係，絕大部分也是和諧的；但對於少數黨員的態度、作風是有批評的。我願意問清楚道理，要求講清楚道理，態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覺得許多黨員沒有把我當作外人，我覺得自己也不應該自外。

7月7日下午三時，周恩來在政協禮堂召開了一次會議，主要就右派的處理問題進行磋商。父親是民主黨派中被停止職務的第一人，黃炎培給周恩來遞了一個條子：「總理：請問國務院工作人員有沒有停職或類於停職的規定？炎培」。他注明這個問題是「為了章乃器」，但為避免承擔責任，他又在條子上注明「隨便發問，並不是我主張」。周公用鉛筆批道：「有這樣一種處分辦法，但對部長級還沒用過。」（見右圖）

兩天後，毛澤東在上海又點了一批右派的名，並且說：「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毛重



新發揮了他的知識份子觀：「知識份子是最無知識的」，「知識份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你看誰人知識高呀？還是那些不大識字的人，他們知識高。」^{②③}

在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對「八大」決議中關於我國社會矛盾的論述提出異議，在與會者中引發了爭論。毛在10月9日的最後講話中斷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②④}這事實上是否定了「八大」的政治路線，並為此後一系列擴大階級鬥爭的舉措開闢了道路。

10月13日，毛澤東指示說：「現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羅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還要說服他，說幾次，他硬是不服，你還能天天同他開會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遠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們人數很少，擺到那裏，擺他幾十年，聽他怎麼辦。」^{②⑤}

同年12月召開的中央統戰會議，提出了對一百多位民主人士「右派」的處理意見。針對當時普遍掌握政策過「左」的現象，劉少奇在會上說：「當前黨的統一戰線，『左』傾的危險是主要的還是右傾的危險是主要的？恐怕還是『左』傾的錯誤更容易犯。現在『左』一點大家都贊成，說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對右派的安排，史良就表現的很『左』，黃炎培也不贊成留章乃器，似乎黃炎培卻成了『左』派。……現在是犯『左』的可能性更多。」他提出：「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是頭面人物，要安排。」當時對這三人處理的底案是：撤銷國務院部長和人大職務，保留政協委員資格，章伯鈞還保留政協常委。

當時給父親定案的最大障礙，就是他始終不肯像別人那樣，違心地承認自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儘管處境艱難，他仍泰然自若，每天準時到糧食部照常工作。據說是因為他在部內威信很高，「威風打不下來」，於是又有人安排了民建、工商聯與糧食部的聯合鬥爭會，自12月19日起開始舉行，兩會負責人均到糧食部與會，連鬥三天，父親安坐聆聽，時而咬住煙斗抽煙，時而閉目養神。到第三天時，某公（父親昔日有恩誼於他）聲討剛畢，父親突然起身走到他面前，大聲說：「你沒良心！」登時全場大嘩。父親如此強項不屈，會是沒法再開了，於是轉而責令他寫書面檢查。

1958年1月，父親寫出了一份三萬多字的〈根據事實，全面檢查〉，回顧了自己在整風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國以來在民主黨派工作方面的全部經歷。他在文章最後寫道：「我對黨批肝瀝膽，希望黨對我推心置腹。……我到現在為止沒有希望逃避處分（當然也不是希望處分）。一個只能為官，不能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當不起一個革命者的稱號，而且不配做一個社會主義的公民。」「我不能顛倒是非對待別人，也不能泯滅良心來對待自己。」

直到被撤職，父親始終拒絕在他的右派結論上簽字。主持審查處理工作的李維漢也承認章乃器「心口如一」，高壓無用，只好硬著頭皮拍板：「我們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簽字，照樣可以定右派」。

就是這樣，父親被定為「極右份子」。

當時給章乃器定案的最大障礙，就是他始終不肯像別人那樣，違心地承認自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1958年1月，章乃器寫出了一份三萬多字的〈根據事實，全面檢查〉，他在文章最後寫道：「我不能顛倒是非對待別人，也不能泯滅良心來對待自己。」

七 鋼筋鐵骨在

風雨沉舟記—— 55
章乃器在1957

父親這種倔強的態度，使他在後來付出了更大的代價。

1958年1月26日，他在民建和工商聯的副主任委員職務被撤銷。28日上午，父親接到總理辦公室電話：周總理召見。他已預感到是怎麼回事，便穿戴整齊，前往中南海。

十一個月以前，他來到這裏聆聽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迎來了一個百花齊放的春天。現在還只是農曆的臘月，再過幾天就是立春，這個節氣來得比去年還早。中南海的湖面卻依然封凍，周圍仍是灰濛濛的一片……沉思中，車已在西花廳前停下，他振作精神，安步踱入這座熟悉的古老建築，周公和習仲勛、徐冰已在客廳內等候。由於事態已經明朗，雙方的情緒反倒顯得比較輕鬆，接下去是一場無拘束的談話。父親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記下了談話的內容^②：

周總理對我說，要撤我和伯鈞、隆基的職，馬上要提出國務會議討論，已經告訴了伯鈞、隆基二人，而且不讓他們出席會議，但可以讓我出席會議申辯。我問，我寫的〈根據事實，全面檢查〉等文件有沒有看過，他說沒有，我說，那是很遺憾的。我問，撤職的事情是否最後決定了。他說，黨中央決定了。我說，那還申辯甚麼呢？我願意放棄出席的權利。他說，那也好，辯論起來我們人多，你說不過我們的。他又說，也曾考慮過是否讓我們辭職，可是又何必那樣轉彎抹角呢？我說，撤職倒沒有甚麼，但是為甚麼要扣上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名呢？這是違反事實的，是寧死不能承認的。他說，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們黨是准許保留思想的。……總理問我作何打算？我說，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黨的，黨給我處分，我願積極接受下來，作為黨對我的鍛煉和考驗。我和黨共事已經三十年了，仍然沒有被了解，那就請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夠，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時我也不過七十歲；我現在就好好地鍛煉體格，充實頭腦，準備到時再為黨工作十年。總理笑着說，你倒真樂觀呀。最後我重申：我是永遠不反黨的；我要使那些誹謗的流言，徹底地破產；我決不做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談話結束，父親與周公等握手道別，離開了西花廳，從此再也沒有來過。他乘坐的黑色「吉姆」轎車駛出紅牆，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望着車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九年來，他第一次有了閒暇……

1958年1月31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撤銷了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的部長職務。把父親的名字第一次排在「右派」的首位，顯然是「加重處罰」之意。2月1日至11日，一屆人大第五次會議提前舉行，會上撤銷了章乃器等38人的代表資格。

罷官之後，父親在北京東城燈草胡同30號的宅院中閉門蟄居。對於一個剛過花甲、精力充沛的實幹家來說，失去工作的權利是一種莫大的痛苦。但他仍

罷官之後，章乃器在北京東城燈草胡同30號的宅院中閉門蟄居，他仍以達觀的態度面對人生，每日讀書、練氣功，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在公眾場合，他仍是精神抖擻，談笑風生，絲毫沒有其他「右派」那種抑鬱消沉之態。

以達觀的態度面對人生，每日讀書、練氣功，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在公眾場合，他仍是精神抖擻，談笑風生，絲毫沒有其他「右派」那種抑鬱消沉之態。

一次政協開會，周恩來和李維漢接見與會的委員們，周公與父親握手時笑着問道：「老章啊，你還是那麼自負嗎？」「是別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負一些。」父親也笑着回答。李維漢有些尷尬，忙解釋說：「誰也沒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你自己。」

在另一次會議中，巨贊法師拍着他的肩膀說：「章乃器啊，我看你的右派份子帽子可以拿下來了。」他風趣地回答：「這是別人強加在我頭上的帽子，我是不認可的；對於我頭上的這頂民主人士的帽子，我倒有點不耐煩了，準備丟掉了。」

某次政協組織到外地視察，同行者中有王楓、董竹君兩位女委員，心直口快的王楓問他：「章先生，我們以前一直讀你的文章，對你很欽佩的，可這一次，你怎麼會當右派？」面對這有些唐突的提問，父親顯得很有涵養：「王大姐，再過十年，你就知道誰對誰錯了。」

可是對有的故舊，父親卻一點不講恕道。在一次政協小組會上，吳大琨碰巧坐在他身旁，父親吟詩一首相贈：「名裂身未敗，家破人不亡。鋼筋鐵骨在，冷眼對豺狼。」以兩人間的歷史恩怨而言，這首詩的份量當然不輕。在經歷了「文革」的劫難後，父親已經作古，吳教授主動提出應給父親平反，這也是應當記述一筆的。

1962年3、4月間，父親向三屆政協第三次會議提交了兩個提案，就他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提出申訴，而彭德懷也在6月間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八萬言的申訴書，雖然兩人並無任何聯繫，但這種舉動在當時被指為刮翻案風。有些好心的朋友向他提出勸告，但父親表示：「『唯事實為最雄辯』，事實越到後來越清楚。我相信事實，我無限相信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我準備在這個過程中多受一些鍛煉，但不能改變我對黨的信任。我認為這一點的硬骨頭是需要的，黨絕不願他的朋友是軟骨頭。」

1963年1月19日，民建中央通過了《關於開除章乃器會籍的決定》。2月14日，民建中央致函全國政協，申明撤銷章乃器作為該會代表的資格，並建議撤銷其政協委員資格（其實在第三屆政協名單上，他已非民建代表而是「特別邀請人士」）。據說，周恩來對開除會籍的做法不以為然。他批評說：「一個人總要有個組織，你們把章乃器的會籍都開除了，將來怎麼做他的工作？」3月7日，政協常委會決定撤銷章乃器的政協委員職務。從此，父親永遠離開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在政治上受到進一步打擊的同時，父親在經濟上也陷入了困境。「反右」後父親的工資由行政四級降為十級，撤銷政協委員職務後，改為發生活費150元，後經周恩來過問，才增加到200元。更有甚者，1957年的那場被人誣告的經濟官司，又被用來作為政治上的打擊手段，致使父親在1964年底敗訴。父親在解放後收集了不少散落在民間的文物，並將約兩千件精品無償捐獻給國家。此時法院又將剩餘的兩千五百件藏品查封清償，並曾一度將他羈押。這宗令新中國法制蒙羞的舊案，至今尚未得到糾正。

1962年3、4月間，章乃器向三屆政協第三次會議提交了兩個提案，就他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提出申訴，表示：「『唯事實為最雄辯』，事實越到後來越清楚。我相信事實，我無限相信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我認為這一點的硬骨頭是需要的，黨絕不願他的朋友是軟骨頭。」

父親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他作了一副對聯：「實踐檢查真理，時間解決問題。」堅信歷史會作出公正的結論。在此期間，有關部門曾根據「來去自由」的原則徵求他個人的意見，如願出國，可提供方便。但父親認為，他是為了自己的愛國理想，才放棄了在香港大有可為的事業和優裕的生活，回來為新中國貢獻力量的。不管個人境遇如何，絕不違背初衷。

不久，一場更大規模的浩劫席捲了全中國，父親遭到更多的磨難，他的生命之火就在這場歷時十年的長夜中耗盡，直至1977年5月13日與世長辭。1997年是先父誕辰100周年和逝世20周年，歷史的恩怨正隨時光流逝，我深切懷念父親和他的各位老同事、老朋友。回首40年前的這場民族悲劇，倍感實現現代化離不開民主與法制。

註釋

- ① 青田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青田文史資料》，第四輯（1991年3月），頁119。
- ② 章乃器在民建會第一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上的發言。
- ③⑤⑨⑩⑬⑭⑮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489；355；428；489；448、452；475；491。
- ④ 章乃器：〈關於兩面性、思想教育、理論性問題的意見（初稿）〉。
- ⑥ 章乃器在民建中央常務委員會宣教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
- ⑦ 《人民日報》，1957年5月9日。
- ⑧ 《人民日報》，1957年5月14日。
- ⑩⑫ 《工商界》，1957年第6期。
- ⑪⑬ 《大公報》（北京），1957年6月9日。
- ⑭ 《人民日報》，1957年6月2日。
- ⑮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卷（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835。
- ⑯ 《人民日報》，1957年6月10日。
- ⑰⑱⑲ 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務委員會宣傳教育處編：《關於右派份子章乃器的材料》，第一輯（1957年6月）。
- ⑳ 《光明日報》，1957年6月18日。
- ㉑ 《人民日報》，1957年7月16日。
- ㉒ 《文史資料選輯》，第82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頁43-44。

章立凡 1950年生，中國現代文化學會理事，近代史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北洋軍閥史、中國黨派史、中國現代化問題及知識份子問題等。長期參與多卷本《中華民國史》的撰稿，與人合著有《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變遷》、《七君子傳》、《民國著名人物傳》、《中國大資本家傳》等；編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